双周 学术

深入学习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新论述

胡孝汉

2020年9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专门召集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其中在专题论述文化建设的第三部分作出了“一个更加”的新定位、提出了“四个重要”的新论断、给出了“两个基本”的新表述，既简明概括了十八大以来我国文化建设的新探索新成果，又擘画预示了“十四五”规划关于文化建设的新思路新部署，堪称论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新篇章，成为奋进文化建设新征程的指导文献。《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以《把文化建设摆在更加突出位置》为题收入了这份重要论述要点。近3年来，文化战线乃至全党全国深入学习领会并认真贯彻落实文化建设新论述，形成很多思想共识，取得很大实践成果。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文化工作发表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文化工作的地位作用、目标任务、原则要求，创造性地回答了事关文化繁荣发展的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的重大问题，指引我国文化建设在正本清源、守正创新中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为新时代开创党和国家事业新局面提供了强大能量。习近平总书记召集教文卫体领域专家座谈发表重要讲话，再一次就文化建设进行专题论述、作出重要部署，进一步提升了我们党对文化工作的规律性认识，进一步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文化学说，为新时期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作了明确指导和有力动员。

一、作出“一个更加”的新定位，着重强调了文化建设的位置和意义。重视文化建设已是社会共识，而重要到什么程度，应将其摆在什么位置，还是一个需从战略高度展开的深刻理论问题和重大实践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文化建设提升到一个新高度：把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一起纳入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摆在中间位置；把文化自信和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并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自信”，并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提出“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兴文化”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此次讲话，习近平总书记开宗明义提出，要“把文化建设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并以此作标题、为专题来展开论述，肯定以前是“突出位置”，强调今后要“更加突出”。这是对文化建设的崭新论述和更高定位。讲话稿中这段论述的领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伟大事业，没有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用的是楷体加粗字体，饶有深意。我们领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既要有经济腾飞、政治变革和军事强大，还要有文化繁荣发展。人类历史上的任何一个伟大文明体的缔造，都突出表现为文化的繁荣鼎盛。这是历史的昭示，也是规律之使然。在脱贫攻坚收官、实现全面小康之际，在“十四五”规划编制启动之后，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中华民族复兴伟大进程，对文化建设的位置和意义做出“摆在更加突出位置”的新定位，并展开深刻而精辟的论述，是高瞻远瞩的，是深谋远虑的。我们要深刻领会，坚决落实。

二、提出“四个重要”的新论断，精辟地阐述了文化的功能和作用。这篇讲话明确指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文化是重要内容；推动高质量发展，文化是重要支点；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文化是重要因素；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风险挑战，文化是重要力量源泉。这“四个重要”的新论断，提纲挈领、言简意赅，阐述了文化的功能和作用，点明了文化建设同国家战略、经济建设、人民生活和社会发展等方方面面的联系，并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论述体系。尤其是把文化视为人们乘风破浪、战胜风险挑战的精神力量源泉，凸显了文化作为上层建筑有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这篇讲话提出的“四个重要”的新论断，既是一种经验的总结、也是一种理论的创造，在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基础上，把文化的功能和作用阐述得更全面、更透彻，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话语体系，必将成为指引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行动指南，也将成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重要遵循。

三、给出“两个基本”的新表述，明确界定了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途径和标准。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关系是个老问题，这篇讲话讲出了既符合国情实际又富有时代气息的新意。提出“发展文化事业是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保障人民文化权益的基本途径”。“基本途径”这一表述，彰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指明了发展文化事业是为了让人民享有更加充实、更为丰富、更高质量的文化生活。讲话还就“基本途径”的宗旨方针、主要内涵和重大措施做了提示。讲话首次明确，衡量文化产业发展质量和水平的一个基本标准，是“看能不能提供更多既能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又能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文化产品”。这一基本标准，校正了过去一个时期一些地方发展文化产业偏重经济效益的观念和做法，阐释了文化产业的社会主义属性及其特点规律。此外，讲话还提出要顺应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发展趋势，加快发展新型文化业态。这些论述，为我们今后加快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指明了途径、提供了标准。

这篇讲话是习近平总书记论述文化建设的重要篇章。习近平总书记在一系列论述和讲话中，提出了我国文化建设的目标任务，强调了文化建设的重要位置和作用，指出了文化事业、文化产业的途径和标准，并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把文化工作切实抓紧抓好。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这篇重要讲话与系列论述结合起来、贯通起来，我们推进文化建设工作就有指南针、定盘星。

首先，落实重要论述和讲话精神，在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方面负有更大责任、要有更大作为。文化战线有五个“方面军”，即文化部门、文化事业、文化企业、文化群团、文化院所。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和讲话精神，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五个“方面军”都有重大责任使命。首要责任就是坚持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正确导向。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定文化自信，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艺创作，为繁荣我国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撑。核心职能是认真“做人的工作”。要将服务工作向广大文艺工作者拓展，不断增强组织能力、活力和向心力；加强行业服务管理能力，不断延伸工作手臂，加强对新文艺群体、新文艺组织的引导服务。总之，团结凝聚广大文艺工作者，紧密围绕在党的周围，听党话、跟党走。中心工作是把广大文艺工作者和文艺家群体中蕴藏的创作能量激发出来，提供更多既能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又能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文化产品，不断扩大优质文化产品供给，推动文艺创作由高原向高峰迈进，促成文艺事业呈现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

其次，落实重要论述和讲话精神，要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上推出更多精品、发挥更大作用。要组织动员广大文艺工作者为完成党的中心任务而奋斗，自觉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开展各项工作。近几年，文艺界围绕中心和大局贡献精品力作。抗击新冠疫情方面，推出《坚信爱会赢》主题MV、《中国医生》等主题电影、“为天使造像”等摄影活动，彰显了文艺界以艺战“疫”的意志决心，也为全民抗疫增添精神力量。决战脱贫攻坚方面，推出电视连续剧《山海情》、大型史诗歌舞剧《大地颂歌》，举办“全面奔小康　共筑电影梦”主题影展，开辟专题版面“全面建成小康，决战脱贫攻坚，文艺界在行动”等，展现文艺界助力精准扶贫的丰硕成果，加大脱贫攻坚重要作品的宣传推介力度。庆祝建党百年方面，围绕这一重大主题创作出《觉醒年代》《红船》《1921》《革命者》等精品佳作，为党的百岁华诞献礼，既履行了文化战线的重大责任，也展现了文学艺术的显著业绩。我们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团结带领广大文艺工作者记录新时代、书写新时代、讴歌新时代，努力创作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民族的优秀作品。”

再者，落实重要论述和讲话精神，要在助力文化产业发展、推动文化旅游融合方面提出更多计策、提供更多支持。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文化产业、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有一系列重要论述，在这次讲话中对此又予以阐述、加以强调：加快发展新型文化业态，改造提升传统文化业态；把握文化产业发展特点规律和资源要素条件，促进形成文化产业发展新格局；要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去年下半年，全国政协党组批准、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组织部分委员实地了解、专题调研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情况。这次调研以上述重要论述为指导、为遵循，着力了解地方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精神的措施和成效，为深入推进文旅融合发展提供典型经验和实践成果，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建议。今后，我们还要继续在这些方面建言献策、履职尽责，努力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和指示要求落到实处、收到显效，助推新时代文化产业开创新局面、取得新成果。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文联原副主席）

学术 随笔

推进版权文化传承传播

——从苏轼看我国宋代版权文化

孙宝林　于梦晓

苏轼是中华文化史上的杰出代表人物，诗词书画皆造诣深厚。据相关统计，苏轼流传至今的诗文作品多达7000余篇，风格豁达旷远、富于哲思、意蕴久远，各类体裁无一不丰、无一不工。苏轼与其父苏洵、其弟苏辙并称“三苏”。三杰同出一门，文思映照古今。“三苏”成为中华文化史上的一段佳话，由父子3人故居改建的“三苏祠”，坐落于其家乡四川眉山。习近平总书记在实地考察时讲道：“一滴水可以见太阳，一个三苏祠可以看出我们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我们说要坚定文化自信，中国有‘三苏’，这就是一个重要例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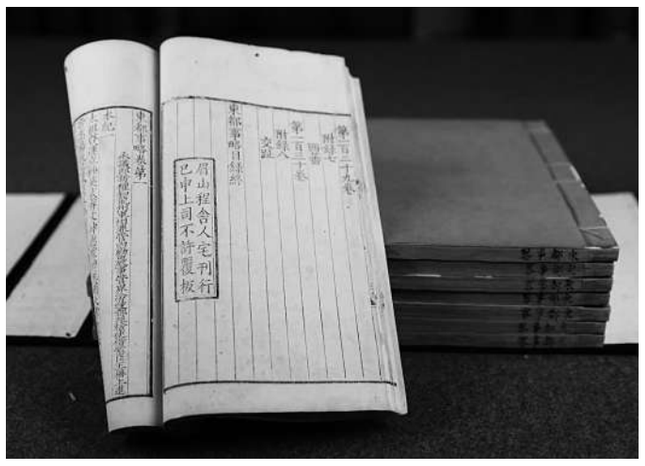
宋代是我国古代精神文化生活发展的高峰。眉山就在这座高峰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刻印记忆。以成都和眉山为代表的蜀刻，与浙刻、闽刻并立，是宋代全国性的书籍刻印中心。印刷有版，版上生权。印刷出版不仅推动了眉山文教兴盛、人才辈出，而且催生了宋代版权思想和版权文化的萌发。宋代古籍《东都事略》牌记刊有“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许覆板”，这是迄今可见世界范围内最早的版权声明，是“版权源于中国、成于世界”的有力印证。透过苏轼的生平轨迹和版权主张，我们跨越历史千年，一观宋代的版权文化。

▲眉山三苏祠博物馆南堂东坡书院

从《钱塘集》看盗印翻刻

熙攘繁荣的宋代城市孕育了兴盛的刊刻出版业。苏轼曾感叹当时诸子百家之书竞相刊行，多且易得。但这也从另一方面为盗印翻刻的孳生提供了条件。作为宋代当之无愧的爆款苏轼作品未能幸免，盗印之书对其诗文随意编排、多有错漏，严重损害了苏轼的作品完整权和人身权，还成为“乌台诗案”中推波助澜的一环。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因诗文讥讽获罪，罗织罪名的重要物证是当时已刊行于世的《钱塘集》，其流行盛况被政敌舒亶描述为“小则镂版，大则刻石，传播中外”。但事实上，这本所谓的苏轼文集从编纂到问世都完全未经作者本人的授意应允，完全是好事逐利之人自行搜集苏轼诗作刊刻付梓。据学者考证，苏轼被私纂盗印的文集曾多达20余种，除《钱塘集》外，还包括《眉山集》《东坡集》《大苏小集》等繁多名类。甚至多有印本流传至当时的域外之地。这也佐证了舒亶笔下的“传播中外”所言不虚。

当时，翻印市面上已有文集也是盗版的主要形式之一。如闽地建安有多家书坊商家，曾将风行一时的苏轼文集依原版摹刻，衍生出名称有别但版式皆同的若干版本，以达到广销逐利的目的。此外，侵犯作者版权还表现为假冠他人姓名出版作品。如宋代理学家邵雍之子邵伯温就曾假借苏轼之父苏洵的名义，作《辨奸论》刊行于世，攻击王安石变法新政，并导致苏洵声誉无端遭受损害。



▲宋《东都事略》，宋绍熙时期初刻于四川眉山，是书系纪传体北宋史，共一百三十卷。图为清康熙振鹭堂影宋刊本。

从“欲毁其板”看版权观念

面对一时无法禁绝的盗版翻刻行径，维权护权的版权思想观念开始萌发，不同阶层的诉求各有侧重。士人阶层受到传统义利观的影响，普遍以立德、立功、立言“三立”为人生重要追求，对诗词创作苦心孤诣、精益求精，正如苏轼诗中云“著书不复窥园葵”，而对于作品能够给其带来的经济收益则态度淡然。因此，苏轼在与友人的信件中多次明确表示，其深恶痛绝之处在于书商因逐利而篡改作品、真伪杂糅，直言“欲毁其板”，以停止此类严重损害自身名誉的私印文集继续传播。但苏轼从未提及惩治不法书商以获得经济赔偿，体现了我国古代文人“重名轻利”的价值观念。

与之相比，商人与手工业者更重视书籍复制发行的财产权利。从下面一个小故事中可窥见宋代刻印畅销书籍的收益情况。曾有一姓名为李仲宁的刻工，拒绝镌刻元祐党人碑，因其曾依靠镂刻苏轼、黄庭坚的文词而摆脱贫困，心存感激，于是不忍下手不法翻刻。一名刻工尚能凭借雕刻文人大家之作而获得温饱，书商获利之丰厚就更可想而知了。因此，如何招徕顾客、稳定客源、避免市场为盗印书籍所抢占，就成了商贾阶层保护版权的重点。

从官文与牌记看版权保护措施

无论是儒学经典、历书律法、科举教辅，还是文论集萃、诗韵英华，众多印本书籍，上系国计民生大事，下系书坊衣食生存，都需获得版权保护，避免剽窃盗刻。版权保护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我国自宋代起就已形成两条主要路径：一是以官方文告保护版权，二是利用牌记宣示版权。这两类举措在历朝历代都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是事实存在的版权保护现象。

苏轼曾表示意欲毁掉盗印的雕版。在宋代若想达成这一诉求可上陈官府，请求发布文告对盗印者“追板劈毁，断罪施行”。官方机构如国子监在新修经义典籍时，也会公告四方禁止私印。鉴于当时的建阳等地盗印不绝，一些外埠禁约盗版的榜文还会被移送至福建当地，以期获得协同保护。值得注意的是，宋代利用官文禁约书坊翻版不仅仅针对印刷出版者，作者同样可以借此维护凝结于书籍之上的创造性劳动成果。

牌记是我国印刷古籍特有的标记。宋人常利用这与正文迥然有别的独立单元，刊印版权标记与声明。一些古籍的牌记中，会详细注明书坊名称与具体位置，这不仅可以进一步明确原版刊行者，以防翻印混淆，还利于口口相传，形成品牌声誉，更可引导读者直接上门选购。如宋代绍兴年间临安荣六郎刻《抱朴子》牌记，先表明书坊前身是“东京大相国寺东荣六郎家”，又告知当下地址为“临安府中瓦南街东”。部分牌记还会注明已上报官府存案，如《东都事略》中的“已申上司”，既可自证为原版，又可警示已与官方强制措施结合。还有牌记会设计融入图形化元素，构成近似“品牌商标”的符号标记，如隆兴年间钱塘王叔边所刻《前汉书》《后汉书》，在牌记上下边栏之内印有空心圆圈及鱼尾花边，文雅优美、引人注目，以示正版。

为强化震慑与保护效果，牌记所涉内容并不局限于一个方面。如《东都事略》牌记就同时含有上呈官府备案、明文禁止翻刻两方面内容。又如宋代睦亲坊陈宅所刻牌记为“临安府棚北大街睦亲坊南陈宅刊印”，除详细标明书坊具体地之外，还一并将牌记最后的“印”字末笔加长弯折，进行图形化艺术处理以做标记，也为版本鉴定提供了佐证。

我们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定文化自信，从历史自觉和历史自信出发，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坚守马克思主义，守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拂去沉积在千年版权文化史上的尘埃，从千年看中国版权，不断推进版权文化传承传播，为文化繁荣发展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贡献版权力量。

（作者孙宝林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版权保护中心主任；于梦晓系中国版权保护中心版权咨询顾问）

理论 速递

刘庆柱：探索中华文明发展的文化基因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研究成果，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第十届、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著名考古学家刘庆柱近日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发表论文《中华文明认定标准与发展道路的考古学阐释》。文中指出，都邑、都城是中华文明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最具代表性的物化载体，是中国古代礼制的重要体现。与世界其他文明以金属器、文字、城市为文明起源的主要标志有所不同，考古发现的礼器、礼制建筑遗址等反映社会礼仪的物化载体，可以作为中华文明起源更为独特的认定标准。

刘庆柱表示，从中国古代都城选址、宫城位置，从“宫庙并列”到“左祖右社”的变化，都城由“双轴线”到“中轴线”的发展，等等，可以探索中华文明发展的文化基因。“中华先民及其后人在历史发展中形成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包容特质的祖先认同、家国一体、家国同构、国家认同传统，是中华文明‘日用而不觉’的文化基因，也是中华文明延续五千多年不断裂的根本原因。”

张德二：以历史文献记录解气候变化之惑

44个具有代表性的历史极端气候事件，190幅自绘插图，一书尽览三千年气候变化之规律……近日，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国家气候中心原首席专家张德二新著《中国历史极端气候事件复原研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极端气候事件是气候变化研究的内容之一，有关现代极端气候的著述很多，而历史时期的极端事件研究尚鲜见。张德二表示，利用历史文献记录来复原过去的气候实况是一项全新的尝试，首先要将源于不同史籍的、点点滴滴的历史气候记录一一串联起来，再作合理的拼合，进而再用天气学、气候学原理来解读这些拼合，力图通过一番科学诠释来重现昔日的气候实况情景，甚而呈现出一幅生动的天气学画面。

书中陈述的44个具有代表性的重大案例，含干旱、雨涝、异寒、异暖各类，分别发生在宋、元、明、清各朝代和不同的冷暖气候背景下。作者进行了历史气候特征值的定量推断的新探索，又将复原的历史实况与现代气象记录进行对比，并用现代天气学、气候学理论酌予诠释，还述及这些事件之社会影响（饥、蝗、疫等）和自然条件背景（太阳活动、火山、海温）诸方面，可以增进对全球气候变化和极端气候事件的认识，将人们对极端气候事件的了解扩展到距今千百年的历史时期。

傅道彬：构建具有世界目光的“中国式”文学批评

近日，全国政协委员，宁波大学教授傅道彬在《文学遗产》发表论文《文学批评的“中国式”话语构建与学术表达》，他认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表述具有面向现代和基于中国两个理论维度。中国式学术话语的中华文化本位立场、总结与传承性的知识体系、始于“小学”的考证方法和短章札记式的学术表达，是“中国式”文学批评建构的思想土壤。

中国文学批评“话语”构建强调“宗经”和“通变”两个基本原则：“宗经”是对文学思想传统和审美精神的坚守，是守正；而“通变”则是文学在时代精神推动下的突破和升华，是创新。傅道彬表示，马克思特别注意到“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因此一定要将“中国式”文学批评的话语构建放到时代性、现代性、世界性的语境里，具有“世界的目光”。

本报记者 谢颖 整理编辑